

中朝中韩关系 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

上

刘金质 杨淮生 庄友桂
朴惠淑 潘京初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朝中韩关系 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



刘金质 杨淮生 庄友桂
朴惠淑 潘京初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朝中韩关系 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

下

刘金质 杨淮生 庄友桂 编
朴惠淑 潘京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

上

刘金质 杨淮生 庄友桂 编
朴惠淑 潘京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F86/3003



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



刘金质 杨淮生 庄友桂 编
朴惠淑 潘京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586/30.03



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

下

刘金质 杨淮生 庄友桂 编
朴惠淑 潘京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F86/30 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 1919—1949/刘金质等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12

ISBN 7-5004-2891-X

I. 中… II. 刘… III. ①中朝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中国-1919—1949 ②中外关系-韩国-史料-汇编-中国-1919—1949
IV. D822.3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615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安 然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式设计 王智厚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兰各庄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458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定 价 90.00 元 (上、中、下)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

首尔大学
韩国学
PDG

前 言

中朝中韩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交往密切。中日甲午战争后，中朝宗藩关系正式宣告终结。这就为在平等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但是，日本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对朝鲜的兼并中断了这一进程。1910年日本强行签署《日韩合并条约》，废朝鲜国号，设朝鲜总督府，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朝鲜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当时中国的清朝政府正处于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困境，对日本的倒行逆施未能作出应有反应。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南北分治，国力衰败，百废待兴，无暇也无力顾及外交。日本以朝鲜为基地不断北犯，对中国进行渗透与侵略。

朝鲜人民不满日本的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于1919年3月1日举行了起义，史称“三一”起义或“三一”运动。它明确提出了朝鲜独立的要求，公布了朝鲜独立宣言书。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公言报》和《每周评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3月23日，《每周评论》发表社论：“这回朝鲜的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我们对之有赞美、哀伤、兴奋、希望、惭愧，种种感情”，“我们希望朝鲜人的自由思想，从此继续发展。我们相信朝鲜民族独立自主的光荣，不久就可以发现。”^①“三一”起义之后，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开展。中国成为了朝鲜人民进行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在中国的东北，他们从事独立战争的团体有诸如北路军政署和西路

^① 只眼：《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1919年3月23日《公言报》。

军政署。他们组建了独立军，活跃在中朝边境，不时跨过边界袭击日本殖民者。日本兵经常侵入中国领土对朝鲜独立军和朝鲜侨民进行报复。日本还蛮横地要求中国禁止独立军的反日活动，并不断挑起事端。吉林是当时朝鲜人、包括朝鲜各派共产主义者从事政治活动的中心。尽管日本不断向中国东北当局施加压力，朝鲜人的反日独立活动并未受到多大的限制，依然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朝鲜人在中国从事反日独立斗争的另一个中心是上海。“三一”运动之后，许多著名的朝鲜革命者云集上海。1919年4月11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在此前后，分别于3月31日和4月21日在海参崴和汉城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① 经过协商决定上海和海参崴的临时政府解散，保留在汉城建立的临时政府，冠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政府所在地设于上海。^② 临时政府的建立和它所开展的活动，对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俊烨先生在《我的长征》一书中说：“从民族史的正统性历史观看来，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我国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是“三一”独立精神和民族魂的体现，是民族国家的潜在形态。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它是韩国史的主体。在朝鲜的王国史终结后，它填补了我国政治史的空白，是新出现的大韩国民族正统的公众权利的源泉。从这些方面着眼，临时政府的历史意义是应当得到很高的评价的。”金先生强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具有民族史的正统性问题，是由于上海临时政府不仅是独立运动，特别是“三一”运动精神的产物，而且是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为止，我们民族存在于国外的民族主权和惟一的政府。”^③ 确实，上海成为了“韩人复兴运动之总根据地”。

① 韩国海外公报馆：《韩国手册》，1992年版，第105页。

② 金俊烨：《我的长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94页。

③ 同上书，第293页。

朝鲜“三一”运动之后不久，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时中国的政局仍处于南北分治的状态，但都对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争取独立的斗争给予了同情、支持。北方政府囿于日本的压力，不敢正大光明地表示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关注朝鲜的独立，早在1919年1月，孙中山在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谈话时明确指出，在会上“宜提出取消中国与列强所订之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掠之各地，承认高丽之独立，庶符民族自决之旨。”^①“三一”运动后，孙中山强调“日本须容韩人之要求，而承认其独立为宜也”^②。当韩国临时政府向孙中山提出互惠条款，其中包括互换外交承认时，他作了肯定的回复。孙中山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对韩国复兴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自不待言。”同时，孙中山表示“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尚未统一，仅广东一省力量，实难援助韩国复兴运动”，“一切实力援助，须待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兴运动也”^③。

鉴于朝鲜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同朝鲜没有外交关系，有关朝鲜的问题都要同日本进行交涉。20—30年代初，中国关注、同情和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不断揭露日本在朝鲜所犯的罪行。中国特别警惕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扩张。日本在朝鲜巩固殖民统治的同时，利用朝鲜作为跳板向中国渗透。日本利用一些朝鲜人来推行自己的侵略和殖民政策。日

① 孙中山：《与王正廷等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② 孙中山：《与日本记者大江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238页。

③ 转引自徐万民：《中韩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页。

本唆使某些朝鲜人在中国走私毒品和黄金，扰乱中国的社会秩序。日本人挑动鲜民强占中国居民的田园。特别是在1931年日本挑动鲜人屠杀在朝鲜的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宝山惨案。中国明确指出，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日本。中国政府就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中国政要和舆论对日本的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韩国临时政府也发表声明，指出“残杀华人系日人所作”。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中朝两国人民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反对日本侵略成为了共同的斗争任务。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上，中朝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中朝革命战友组建了东北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许多在华的朝鲜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些组织包括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同盟、朝鲜独立同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朝鲜青年联合会、朝鲜义勇队等等。还有许多人直接参加了八路军和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他们英勇抗战，不怕流血牺牲。韩国临时政府从上海迁到重庆后，一直坚持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了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向他们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和尽可能的方便。韩国临时政府组织了光复军，直接投入了抗日战争。

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的独立。1940年1月8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争取东亚解放》，指出“中日战争的起点在朝鲜，则其终点也须在朝鲜，要问中国抗战的‘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毫不踌躇的答复：在朝鲜！”。社论说“我们要收复北方，要收复东北，要台湾回到祖国，并且要解放朝鲜，朝鲜独立了我们的抗战才算到了底”^①。1942年3月

① 1940年1月8日《大公报》。

22日，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朝鲜独立问题》的长篇讲演，说现在“正是我们重新提到韩国独立，复兴韩国问题的时候，因为日本侵略东亚大陆，是以韩国为起点，将来也一定是以韩国独立复兴为终点”。这位立法院长坚信“此次大战之后，韩国必可独立”^①。1942年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完成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方案的总纲指出：“建立东亚永久和平，对朝鲜在华各革命团体予以积极的扶助。期培成其复国的力量，重建完整之独立国家”，称“应以亲爱精神与热诚谦和之态度接待朝鲜各革命团体”。方案要求“在抗战期间，朝鲜各革命团体，应配合我方军事要求，参加实际抗敌活动，以加速日本帝国主义之崩溃”。方案表示“于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②。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在会见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时说：“中国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扶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此种工作甚为艰巨，希望韩国革命同志能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以完成复国运动。”^③

中国为争取朝鲜的独立开展积极的外交努力。1942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拜会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承认朝鲜独立和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罗斯福表示美国尚无此意，说单独讨论朝鲜独立问题时机尚不存在。此后，中国政府有关官员一再重申承认朝鲜独立的立场，以期得到美国的重视与支持。11月9日，宋子文再次强调协助韩国在战后独立将是中国的一项义务。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保持经常接触，坚持朝鲜独立的主张。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向罗斯福重申了协助朝鲜独立的主张，并得到了罗斯福的赞同。在讨论《开罗会议宣言》文本时，英国代表反对提及朝鲜独立问题。中国代表坚持自己的正确立

① 1942年3月23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

② 徐万民：《中韩关系史》，第289—290页。

③ 同上书，第294页。

场，得到了美国代表的支持。英方作出了让步。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郑重声明：“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内，使朝鲜自由独立。”^①在随后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上，苏联同意开罗会议对朝鲜独立的保证。中国政府关于朝鲜独立的主张得到了国际认可，从而为朝鲜争取独立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中国势单力薄，无法实现中国政府的主张和韩国临时政府的愿望。

中国政府事实上早已承认了韩国临时政府，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并为争取国际社会对它的承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政府认为，争取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是朝鲜获得独立的重要方面。1942年3月22日，孙科指出，“我们在目前要援助韩国独立，最重要的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他论证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是，美国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样就为中国“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国国力有限，在国际舞台上难有施展抱负、发挥作用的机会与能力，不能不受到大国外交的制约。中国在国际上争取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由于受到美国英国态度的制约与影响，中国政府也没有对韩国临时政府以正式的外交承认。这对中国政府和韩国临时政府来说都不能不是一件憾事。韩国临时政府谋求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和中国为此所作的努力都无功而返。

中国政府和韩国临时政府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的原因是美苏两国另有图谋。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美苏都在构筑自己的战后蓝图，加紧瓜分势力范围，抢占战略要地。朝鲜自然成为了美苏瓜分的对象。此时美苏都把对朝鲜独立的承诺置于脑后。早在1943年罗斯福首先提出对朝鲜实行托管。1945年2月，美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达成了共同占领朝鲜的默契。美苏决定在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势力范围。根据原来的约定，

^①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苏军在1945年8月8日向日寇宣战。苏军在朝鲜顺利推进。美军9月8日开始在仁川登陆。日军投降后，美军政府10月10日在汉城宣布成立。为了解决朝鲜问题，美苏英三国举行了莫斯科外长会议，并作出了有关决议。美苏建立联合委员会，协助朝鲜建立临时政府。美苏在朝鲜有着不同的打算，推行不同的政策，支持不同的政府，这样就不可能为解决朝鲜问题达成谅解。朝鲜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苏联在朝鲜北部进行民主改革，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美国在朝鲜南部扶植、并建立亲美政权。朝鲜南北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分别同苏联和美国结盟，成为东亚冷战的前沿阵地。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给中国人民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兵戎相见。在对待美苏在朝鲜推行的政策和南北朝鲜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与态度针锋相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苏联在朝鲜的政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在南部的政策和大韩民国。国民党政府则恰恰相反，坚定支持美国的政策和李承晚政权，敌视苏联和北方政府。鉴于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不可能采取实质性的外交举措。中国国民党政府完全被美苏排除在解决朝鲜问题之外。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苏联在朝鲜北方的政策和北方的政治发展，除了表示反对，不可能施加任何影响。中国政府虽然全力支持美国在韩国实行的政策，但对韩国的事务也不具丝毫影响力。韩国临时政府1945年9月2日就朝鲜获得解放发表声明。声明感谢中国对朝鲜独立运动的宝贵支持：“中韩两国在历史及地理上自有特密切关系，中国自革命以来，对我国之独立运动最表同情，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临时大总统时，且曾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而蒋主席自国民革命后，辄予以我以最佳援助。”^① 声明称韩国临时政府的三大工作是：立即返

^① 1945年9月4日《中央日报》。

回故国，藉盟军之力驱去日人；将韩国临时政府之权利归还于韩国国民，实行自由选举，组织正式政府；与韩国人民同心戮力使韩国从速独立，此事已由同盟国家在开罗会议中决定矣。中国政府隆重欢送韩国临时政府返国执政。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中韩文协和蒋介石先后举行了宴会和茶会。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于1945年10月24日设宴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致辞中，对韩国革命志士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后，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始终不懈之精神倍加推崇，期望韩国在盟军协助之下，努力复兴建设工作，以奠定独立富强康乐之国家。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在答词中对中国援助朝鲜独立运动之热忱致忠诚之铭感。^① 10月29日中韩文协举行欢送韩国革命领袖返国大会，该会理事长孙科发表讲话，称韩国革命同志在中国工作数十年，今幸祖国已获解放，不久即将重返故乡，至堪庆慰。韩国人民久被日人压迫，所受痛苦极深，故诸位光复救国之理想虽已实现，建国工作仍急待进行，韩国正式政府亦得成立。回国之后至盼诸位领导人民开始建国事业，加强中韩合作，并与美苏等盟邦取得密切联系与谅解，建立一个民主独立自由之韩国，共同担负维护世界和平与制止侵略者再起之责任。金九致辞，说他本人离开朝鲜已经27年，在此期间得中国友人帮助甚多。此次回国必携带此种感情转告国人，然“仍深望中国对吾人之建国工作继续协助，一如过去赞助吾人之革命”^②。蒋介石在11月4日举行茶会。他在致辞中称，中韩两国历史之悠久，交谊之深厚，关系之密切，今后可将增进两国友善之邦交。他希望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后集中力量，精诚团结，为韩国自由独立之建国工作而努力，并联合东亚各国及美苏英等盟国，不分种族与肤色，一致合作，以求建设人类和平幸福之新世界。金九表示回国后定以过去

① 1945年10月25日《中央日报》。

② 1945年10月30日《中央日报》。

革命精神为韩国自由平等独立之建国工作而努力，并盼望中国及其他盟国继续援助，互相合作，为世界人类和平幸福而努力。^①次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欢送韩革命领袖归国。”社论在强调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之后说，基于“纯洁而真挚的革命友谊，韩国各种革命团体，从事于革命复国的运动，向得我国一般社会广泛的赞助与同情”。“中国本着一贯的友谊，对于韩国的建国，尤当尽其纯洁真挚的赞助，一如以往数十年赞助韩国革命复兴的运动……我们不仅希望韩国独立建国的速成，尤希望其能建成一进步强盛的国家”^②。

美国在南部完全器重和依靠亲美势力，排斥在中国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多年的韩国临时政府。由于美国的原因，韩国临时政府回国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美国只允许金九等以平民的身份回国。韩国临时政府因政见不同不断发生分裂。在韩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金九等逐渐失势，李承晚等占据了优势。中国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同李承晚的关系。1947年4月10日，李承晚来华访问，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李承晚在书面告别谈话中称：“数千年来，中韩一家之友谊，载于典籍，而吾韩被日本侵略以后，渥承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公、暨今主席蒋公，竭诚协助吾韩之独立，尤以韩临时政府在渝时所获之助力，及开罗会议时主持正义，首先提出保障韩国独立之厚谊高情，使吾韩民众心中感激而不忘。”^③1948年1月，中国政府命刘驭万为驻汉城总领事，“藉以促进中韩两民族各方面之交流，从而奠定永久友好亲善之基础”^④。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支持韩国独立的斗争。

① 1945年11月5日《中央日报》。

② 同上。

③ 1947年4月15日《中央日报》。

④ 1948年1月9日《中央日报》。